

傳播與國家發展*

潘家慶

「傳播與國家發展」理論自本世紀六十年代建構以來，已成為應用傳播學中重要的一支。七十年代以後，因為第三世界學者的挑戰，曾經引發了無數爭辯，轟動一時。近年來似乎轉趨沉寂，但這並不表示這個問題的理論與實際走到了盡頭。反之，只要人類存在一天，國家體制、社會體系一日未廢，世人就需要藉著傳播來互通有無，促動進步，造福大眾。二十年來，傳播與發展的理論，雖然一直缺少清楚的輪廓，但二十年來的研究、辯難、演化，已使它的目標精神愈來愈清晰、明朗，跟其他歷史悠久的社會課題相比，似乎毫無遜色。

基於人類不變的需求，和傳播與發展的目標精神，筆者將近十年來教學、研究之餘的思考與心得記述下來，希望能為本國的「傳播與發展」建立系統的概念，更寄望，因此能引發學界與政府的注意，共同為中國本位的「發展性傳播」而努力。

「傳播與國家發展」這個論題牽涉層面極廣，舉凡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傳播等學科都不能偏廢；要討論的問題也極為切要，上自謀國大政，下至升斗小民生生活無所不包。本書當然無法一一討論，大體上只能從國家發展策略與發展性傳播，在理論上及上層結構的擬想上略作論列。不過本書也嘗試從實徵研究資料，從本國社會實際的發展與傳播工作，探究一下傳播與發展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這些試探性的努力，無非是一個論題的提出，

* 潘家慶(1983)《傳播與國家發展》，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，本文是作者自序。

希望各方面的專家，對未來我國的國家發展與傳播，開始作系統的研究、評價，與夫對未來作精確的建議。

誠如本書各章討論中所呈現的涵義，傳播與發展為人類社會一項鉅大的心靈工程。從喚起人本的意識，到培植有利的態度、價值，進而能使社會多數參與，共謀大眾福祉。然對今日我們的社會來說，這不啻是一個遙遠的理想，但我們今天總得起步。起步之前，最重要的莫如讓大家知道，發展政策要在什麼心態與原則下來製訂？發展性的傳播動力如何？障礙又在那裏？

作為這個論題的一項「引言」，筆者在本書中反覆「指出」，傳播與發展不僅是社會科學中一項嚴肅的命題，也是人類命運思考上的一大挑戰。本書第一章的結尾曾這麼說：「這項思考的挑戰中，人是否能祛除他們的偏見與私利、好大喜功？人是否能多懷惻隱之心，為後世子孫，為全體人類命運多作思量？實在是知識份子、政策制定者一項無上的道德使命。」因此本書極力從一個「人本」的出發點，討論政策應走的方向，注意人的發展，包括環境保育與對後世子孫的責任。在傳播方面，本書主張傳播制度「走自己的路」，發揮本國的媒介傳統，讓發展性的傳播脫離口號，從此起飛。

本書附錄的三篇文章，純然是從本國角度檢討觀念，探討問題，可以補充本書最後三章的論點。

本書之成，首先要感謝業師徐佳士教授，是他最早給了我這份挑戰。1972年春天在明尼蘇達大學進修時，徐師一封「勸歸」的信函，要我準備在研究所開這門專題課程，當時對我來說，是一個不小的誘惑。1974年開始，徐師主持了一項長達三年，名為「我國的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」的實徵研究，自己能恭逢其盛，獲益很多。1978年在國科會的資助下，也是徐師的鼓勵下，我以「傳播與發展」為題，前往史坦佛大學作一年進修研究，眼界大開。這些也許不是「謝忱」可以表達的，但卻代表了這本書的源流，心中自有無限的感念。

誠如上述，本書第八章、第九章部分資料，來自政大新聞研究所的那項實徵研究。對於協同研究的伙伴們，像楊孝滌、趙嬰、鄭振煌諸先生，特在此表示謝意。

這本書能「這麼快」出版，要謝謝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的「催生」，也謝謝他把這本書列在新聞所出版叢書的行列。

假如這本書還算是一點知識上的成果，那是數不清的前人、看得見與看

不見眾多師友、家人、學生等無私的給予。這裏只能列幾位「近因」的人物，聊表一點心意。羅吉士教授的著述、和那年我在史坦佛他給我寶貴的意見；新聞系助教嚴沁蕾與陳曉蘭兩位協助校對；新聞系學生陳美岑、吳筱玫的謄稿與校對，謝謝！辛苦你們！

最後，我要把這本書獻給

我的母親，謝謝她給我受教的機會，才有今天這點成果。母親自幼父母雙亡，少年時代就要負起主要家務責任，沒有機會受教育。來到我們潘家，生活更形艱苦，然而即使在三餐難繼的歲月中，她始終堅持自己操勞，不令我們教育中斷。她是標準的「敬愛知識，尊重知識」的中國人，也表現了中國婦德最崇高的一面。用這樣一點獻禮來祝賀她老人家即將來臨的八秩晉二華誕，實在是微不足道的。

潘家慶

民國七十二年六月於指南山麓